

013897

当代外国 政治书摘

第一辑

「社会主义阵营」的马克思主义

党政分开

西欧民族共产主义

非洲的意识形态与发展

戈尔巴乔夫及其言论

斯兰斯基审判案始末

〔南〕 弗兰尼茨基著

〔美〕 阿·卡特著

〔英〕 霍·马钦编

〔美〕 克·扬著

〔捷〕 贝利康编

当代外国政治书摘

第 一 辑

東方出版社

封面设计：倪天熙

当代外国政治书摘

DANGDAI WAIGUO ZHENGZHI SHUZHAI

第 一 辑

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850×1168/32 10.25印张 242,000字 0,001—2,800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东方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书号 3453·11 定价 2.05元 (内部发行)

编者的话

在当代，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也在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是一种发展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生命力就在于：它始终面向不断变化的世界，面向丰富的社会实践，面向人类光辉的未来。

在当前的世界上，社会主义运动、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以及科学技术革命，已汇成一股强大的历史潮流，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与此同时，国外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于社会主义的各种“模式”、各类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以及对于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中新情况和新问题的研究，也日趋活跃、逐步深入。可以说，当代社会主义的实践丰富多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探索和研究，也得到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采取了对外开放的政策。1985年1月，胡耀邦同志在接见中央党校毕业生时说：“长期以来，我们地方和单位处于封闭状态，对于别的地方发生了什么变化，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一概不大晓得。在当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了解世界大事和社会主义运动新形势，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因此，面向世界的问题，也就是面向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面向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问题。

为了向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国外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和资

料，我们编辑了这套《当代外国政治书摘》，内容包括：当代外国政治学术新著的摘译、译述和介绍；有影响、有代表性的思潮、流派或代表著作的评介；新书信息等。计划陆续编辑，分辑出版。

我们这个书摘园地将以有限的篇幅容纳尽可能多的信息，并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帮助和批评。

1985年7月

目 录

书 摘

- “社会主义阵营”的马克思主义(选自
《马克思主义史》第二卷)〔南〕弗兰尼茨基著 (1)
党政分开(选自《南斯拉夫的民主改革》)〔美〕阿·卡特著 (47)
西欧民族共产主义〔英〕霍·马钦编 (101)
非洲的意识形态与发展〔美〕克劳福德·扬著 (135)
戈尔巴乔夫及其言论唐修哲、孙维熙编 (176)
斯兰斯基审判案始末(选自《禁止公布
的文件》)〔捷〕贝利康编 (217)

书 介

- 社会主义与未来(〔苏〕沙赫纳扎罗夫著)赵国琦 (250)
西欧基督教民主党(〔英〕欧文著)吴 名 (259)
当代中国社会学与社会主义(翁修伦著)张德广 (263)
* * *
东欧共产主义(〔加〕哈姆斯通等编)林穗芳 (271)
罪行与妥协(〔英〕肖克罗斯著)侯凤菁 (278)
印尼“九·三〇”事件(美国中央情报局
调查报告)谢志琼 (285)

书 讯(十七则)

西欧共产党比较研究(299) 英国的托洛茨基主义:理论与实践(300) 新马克思主义:现代激进主义的意义(301) 美国劳动人民党:美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302) 澳大利亚政党政治 1966—1981 年(302) 法共参政(303) 华盛顿和东欧(304) 西班牙和葡萄牙社会党 1973—1979 年经验的比较分析(304) 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当代问题和前景(305) 绿党政治:全球的希望(306) 法国社会党:东山再起与胜利(307) 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308) 中东政治词典(309) 非洲农村政治经济学论文集(310) 东南亚的共产党武装运动(311) 苏联大战略(311) 持不同政见者手册(312)

“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丛书书目(一) (315)

书 摘

“社会主义阵营”的 马克思主义

〔南〕弗兰尼茨基著

胡文建译

南斯拉夫当代著名学者普·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是迄今为止比较完整系统地论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部著作。初版于1961年，1963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中译本。以后作者又三次修订再版，1977年出版了修订第四版，这版的中译本即将问世。原书分为三卷。这里选登的两章出自第二卷第五部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第一篇“‘社会主义阵营’的马克思主义”，是作者新增补的。作者分别论述了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当代若干具有独立见解的重要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术观点，他们包括波兰的经济学家兰格、捷克学者奥塔·希克，以及波兰的哲学家亚当·沙夫和科瓦科夫斯基等。他们的著作已先后有中译本问世。

第 五 章

马克思主义在波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在波兰的发展，如同在阵营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物质方面和意识形态

方面对苏联及其某些变化的密切依赖。然而，要想理解马克思主义在波兰的发展的一些特殊现象，至少还应当注意若干情况。波兰人在自己世代代苦难重重的民族历史上，曾经由于德国封建主义和俄国专制主义的瓜分而四分五裂，他们看到了，社会主义是实现他们世代代谋求民族自由发展的正当愿望的办法。因此，他们在战后发展中的主导思想，依然是寻求波兰进入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

应当指出，波兰人在社会科学领域，以及在马克思主义领域，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曾经具有意义重大的传统。他们许多科学工作者和整个的学派曾具有超出本民族范围的那种意义。在两次大战之间，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较差，但应当把这一情况同这样的一个事实联系起来看，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当时处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当时，共产党是非法的。在这种条件下，那些从事地下活动的人很难在理论方面有所贡献。此外，波兰共产党恰恰遭受了苏联斯大林主义的极其可怕的打击，在对最优秀的革命干部实行大清洗的过程中，波兰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尤·连斯基、阿·瓦爾斯基、维拉·林斯特舍娃等）丧失了生命，共产党情报局把波兰共产党解散了。

德国法西斯很快就占领了大部分波兰领土，波兰又重新被瓜分。一部分共产主义的积极分子迁居苏联，另一部分则留在沦陷区，坚持地下活动，组织小股的游击队和游击行动。瓦·哥穆尔卡是其中之一，他在战后的各种可能性的界限内力图坚持认为波兰形势具有一定的特点，从而力图避免完全屈从斯大林的模式。

然而，各种情况阻碍了某种较为自由的社会主义发展。首先，最重要的一个事实是波兰不是自己解放自己的。其次，存在着只有一条社会主义道路这种僵化的非辩证的斯大林主义观念，而且许多领导人物都支持这种观念。最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利，这

不容许它实行某种广泛的政治思想谋略。这一切说明，在斯大林主义的压力下，波兰人不可能实行他们本可以实行的真正的独创的发展。甚至一些象哥穆尔卡这样的人物也对斯大林排斥异己的做法存有戒心。特别是在情报局施加压力，企图迫使南斯拉夫党的领导屈从苏联的观念未能得逞之后，波兰出现了完全屈从苏联的观念和政策的情况。哥穆尔卡 1948 年就被撤离党的书记职位，1949 年底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951 年被捕入狱。

于是，用不折不扣的马基雅弗利的方法推行与马克思主义完全相违背的主张的做法又重新出现了，而且此时在苏联国境之外也采取这种做法，但是，在所有这些国家里这只能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无须特别指出，斯大林主义的制度具有灾难性的后果。也无须特别指出，工人阶级，尤其是以言论自由为必要生存条件的知识分子，好不容易在二十大以后才遇到虽然是不彻底的非斯大林主义化运动，开始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开始自己的发展的新阶段。在差不多是全体人民的压力下，发生了 1956 年波兰十月事件。哥穆尔卡重新领导党，当时的波兰中央委员会的一部分委员也为此出了力。非斯大林主义化的过程就这样开始了，几乎所有的重大问题，如国家和官僚主义问题、对经济生活实行官僚主义行政中央集权管理问题、工人委员会问题，直至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理论问题，都提到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日程上来了，虽然依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苏联。

社会主义关系的结构问题，以及经济政策和管理体制问题，自然成了首当其冲的问题。在这一经济领域，在这一最新时期，奥斯卡·兰格（1904—1965）是最著名的人物，他在两次大战之间这一时期完成了法学和经济学的研究。他由于自己所持的社会主义观念而不能在大学里工作，便赴美国，在那里熟悉了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学理论和政策。兰格当时就参加了一场辩论，即第一次世

界大战后在某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L·米塞斯、F·A·哈耶克)和社会主义者 M·多布、莱奇特等人之间开展的关于在社会主义下合理的经济核算的可能性的辩论。

战后,兰格成了主要的波兰经济学家,他同切·博勃罗夫斯基领导 1956 年底政府设立的经济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中,兰格试图在社会主义下推行他自己的某些经济学主张,同时运用几十年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发展的最新经济分析方法、经济计量、程序设计等等。

早在 1957 年,他在一次关于波兰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讲座中提出了波兰模式问题。他认为,这个模式必须是从自身的经验中发展起来的,而不是“从上面”发布命令规定的,其特点之一必须是集中的经济计划同尽可能深广的分散管理相结合。他认为,这一模式的第二个特点是经济管理必须依靠在集中的计划范围内进行的工人自治和合作社自治。

关于价格形成问题,兰格当时提出一种看法,认为价格必须符合价值规律,但又必须主要由国家来规定。

兰格在许多文章和讨论中发表了自己对社会主义和当代世界问题的看法,这些文章后来汇编成一本论述当代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的书。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同,这个矛盾与阶级利益无关,因而不具有对抗性质;因此,今后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由于掌握了经济规律(一般的和特殊的经济规律),矛盾将走的是一条平坦道路。

社会主义本身有四种规律性。首先是适用于一切经济制度,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般规律(生产和再生产规律)。其次是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这些规律是由新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基本生产规律是创造利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则是满足人的需求。再其次,一定的生产关系决定人在社会中的相

互关系的种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基本的规律是垄断和竞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则是计划。“在这方面我们打算不谈计划的方法，不谈是否应当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实行中央集权制还是非中央集权制，我们仅仅肯定这样的事实：生产资料公有制本身要求由社会主义社会对经济过程进行自觉的、有目的的管理，并在这个意义上决定着计划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这样的社会中经济规律没有自发的性质，而是被自觉地运用于为人的目的服务的原因。”除了这些规律之外，兰格还指出，价值规律和货币流通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因为它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从几种社会主义所有制中，以及从分配的方式中产生的。（见《现代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趋势》一书，1964年德文版）

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两个基本形式是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公社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等），生产资料的管理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它必须是维护公众利益的；它必须具有自决的权利。由此可以看出，两种极端都会危害管理的社会主义性质。第一种极端是，如果缺乏维护公众利益的原则，就会导致对社会持不负责任态度的纯集团所有制的产生。兰格把这称为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蜕化。第二种极端“是工人在企业内缺乏有效的自决权，我称之为官僚主义的蜕化。在这种场合，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是虚拟的，因为劳动者对这些生产资料的使用几乎没有直接的影响。这种状况会带来产生新的一种生产者与产品相异化（我们暂且使用马克思的一个著名术语）”的危险。

兰格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重大特征，社会主义的实现就形式来说在不同的国家是千变万化的。兰格甚至认为，在社会主义的最初阶段，从集团所有制对共同体的利益的关系来考虑，以及从中央集权管理对劳动者的自决的关系来考虑，出现某些变形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如果一开始就要在高度的中央集权制或非中央

集权制之间进行抉择，兰格认为，“革命过程要求国家集中支配经济辅助资料。由此产生集中计划和管理必然性。我认为，这适用于任何社会主义革命”。

在这个时期，经济上的动力由对工人阶级进行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号召，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觉悟的号召所代替。在这些场合，经济是高度政治化的经济，这种经济可以称之为特殊的战时经济。它的存在具有特定和必要的界限。这些方法是不灵活的，因而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庞大的官僚机构的建立，这又越发使生产难于适应居民的需求。兰格认为，从这些行政管理方法向以运用经济规律为基础的新体制过渡，意味着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一过渡时期的结束，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行使职能的开始。他并不认为这是过渡时期问题的唯一的一个方面，但无论如何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

我们虽然不能完全同意这些说得如此绝对的观点，但社会主义各国迄今的发展情况基本上已经显示了这种发展情景则是事实，唯一要补充的是，几乎在所有场合，这种发展都极大地加强了官僚国家主义势力，并扼杀了许许多多真正的社会主义关系的萌芽。而这仅仅是指出，早在这阶段就已经必须采取某些重大措施，以纠正这种行政体制了。此外，我们同意另一个通常不乐意作出，但对社会主义以往过程的客观的考察和分析必然会证实的论断。兰格继续谈道：“在研究这个时期时还必须考虑到一个重要的社会学因素：在一个不发达的国家里，工人阶级是很弱小的。我觉得，首先，工人阶级弱小，就会使官僚国家机关获得过左的意义，并且会使‘个人崇拜’这种现象得以产生。国家机关充当了工人阶级自发的积极性的代用品”。

但是，这些中央集权的方法导致了迅速的工业化，造就了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最后导致了要求改变管

理的方法。兰格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重大区别也正在于此，因为在这一场合，既然没有统治的阶级，也就没有对这些措施的原则性的抗拒。可能有某些集团或阶层坚持用旧的方法进行管理，但它们不会强大到能够阻止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改革。应当在此指出，这些阶层的反抗比兰格所说的要强大得多，一个强大的国家和党的官僚阶层的意识结构和利益结构可能表现出来的一些特征，比兰格所说的要更多地近似阶级的特征。这样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出现一些完全是非社会主义的行动，存在着对社会民主化和舆论民主化（在这当中，工人自治从基层到上层的发展是这整个过程的重大问题）的强大反抗。

兰格认为，这些主要经济职能非中央集权化的现象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以不同的速度和不同的形式出现。兰格在谈到计划时，主张积极的计划，这种计划必须包含两类资料：“第一，国民收入在消费与积累之间的分配；第二，各经济部门的投资分配。”

兰格考察计划过程中提出的某些问题时强调说，在资本主义中，在某种程度上也有计划，即超出一个企业的合理化的狭窄界限，协调各个企业的活动，例如有托拉斯和卡特尔，直至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经济干预。然而，与社会主义的计划不同，这些计划工作不能包括整个国民经济。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从资本主义那里，除了生产力之外，只继承了资本主义企业生产合理化的方法论，特别是核算和簿记，以及经济原则的思想本身。这是一笔巨大的历史遗产，但对于实现生产和分配的社会合理性来说是不够的。

兰格在自己的著作中还分析研究了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看到它们的地位的特殊性，看到它们不可能走以往古典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也不能按照社会主义各国到目前为止已有的模式发展。他把这第三种经济和社会发展型式称作“民族革命

的型式”，并认为这种型式与社会主义的发展有某些类似之处（国家的强大作用、国有化、土地改革、计划化）。

兰格还认为有必要谈谈自己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工人阶级的贫困化问题的立场。这显然是由于直至现在，在阵营的大多数国家里依然流行着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观点。兰格指出，这种观点是荒谬的，并明确主张用相对贫困化加以解释，强调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起作用的是不断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的内在趋势，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必然不断地反抗这种趋势。

正如我们看到的，兰格对当代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是持坦率态度的。他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观点和探讨，遵循两个方针：第一，坚持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发挥经济规律的作用和运用最新经济分析和数学分析方法，以此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取得最大的效果；第二，主张实行部分的分权，灵活的总计划和发展工人自治，以避免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化和由此产生的一切不良后果。然而，这些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基本主张，他没有始终如一地贯彻到底。

在哲学家当中有一个人，他与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实行了最深刻的决裂，他把自己的全部才能，都用来砸碎窒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和辩证思想的教条主义坚硬积层。这个人就是**列泽克·科瓦科夫斯基**（生于1927年）。他的文章和评论所论述的问题，基本上是继一种斯大林主义的实践和理论之后必然产生的一些中心问题：马克思主义问题、人的问题、历史问题。科瓦科夫斯基任教于华沙大学，他由于自己敏锐的思维、无畏的精神和清新的风格而很快成为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深受波兰青年的尊重，但又备受党的官僚的攻击。

他的文章涉及的方面很多，我们打算只谈其中若干最重要的方面。此外，我们也不打算谈论他的论点和看法当中哪些是论据

充分的，因为科瓦科夫斯基常常竭力把某些观点推到极端，用这种办法使问题变得尖锐。但是，如果一个所论述的意识形态体系在一个历史性时刻崩溃了，那是不能把寻求新的道路和新的解决看作是不流血的直线的过程的。

完全可以理解，科瓦科夫斯基在目前围绕马克思主义展开的激烈论战中主张一种“理智的马克思主义”，即主张一种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恰恰被斯大林主义化和教条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变种完全抛弃和否定的马克思主义。《现实的和非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一文指出，斯大林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说成是“制度的而不是理智的现象”，根据这种概念，例如黑格尔这个人，在1945年可以被说成是德国的沙文主义者和战争辩护士，而在1954年又可以被说成是伟大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家。从“理智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事情便有些不同，就是说，对于斯多葛派的哲学或米茨凯维奇的诗歌，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有一种唯一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当然，这里可以用得着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论的一般规则，但得出的结论必然各不相同，因为，如果以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可以充当对数表，从已知的许多相同的资料就总可以象用计算机一样得出意义相同的结果”，那是极其错误的。因此，科瓦科夫斯基反对划分维护教条的纯洁性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他主张划分出人道主义的左派和人道主义的右派。精神科学方面的理智左派是指这样的人，他们的表现是：思维的彻底的理性主义、坚决反对科学中的任何神话、极端的批判主义、不相信臆想的教条和封闭的体系以及要求直言不讳。这暗示决心修正以往接受的论点和理论，对其他学术观点采取宽容态度，同时决心向任何非理性主义宣战。持有这种立场，就能够接受马克思的一切伟大的主张，而又能够看到马克思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对后来的历史进程所作的预言，是有错误的。

在这种前提下，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是可以全盘接受或全盘抛弃的任何教条，不可能是任何包罗万象的体系，而是对世界进行最一般的观察时活的哲学启示，是在人类的社会理智和社会意识中继续发挥作用和活动着的冲动。

根据这些研究分析，科瓦科夫斯基反对官方对意识形态概念所作的理解。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是某一社会集团用以调整价值观念的观点的总和，那些价值观念既是其神秘化了的利益意识，又是其活动的反映。换言之，在科瓦科夫斯基看来，“意识形态的社会职能在于维护使集团能够有效地活动所必需的价值观念”。所以，意识形态和科学之间的区别，不是非真理和真理之间的区别，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它们的社会职能不同，而不在于它们的真理性。同样，这也并不是说，意识形态简单地是由非真理的论点组成的，因此也不是说，意识形态的承认根本不是纯粹的理智行动，而是为了某种社会活动而进行的实用主义的确认。神话和空想也属于意识形态领域，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主义理想也是空想，而这又根本不是说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当我们说社会主义理想具有意识形态性质时，我们并不认为必须把它抛弃。“但是，相信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就象一条物理定律一般可以得到无可辩驳的证明，那是天真幼稚的”，认为社会主义的必然性绝对可以得到科学的预见，那确实是意识形态的信仰行为。

这种看法是以科瓦科夫斯基的这种观点为基础的：在精神科学中，特别是在哲学和社会学中，基本概念连同表述这些基本概念的论点，从来不具有相同的意义。由此同时可以看出，规定真理的某一领域不得怀疑，那是轻率和十分危险的，因为这会导致在科学中建立形形色色的外行垄断。要是那样的话，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这样的词充当施加压力和